



他们受委托给老人当起“儿子”

空巢老年人情感需求催生“外包儿女”新业态

调查动机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1亿。而《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2%。

数据背后,老年人群体对情感慰藉、人格尊严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已形成对相关服务的巨大期待。“外包儿女”服务应运而生。

“外包儿女”指由第三方人员以“临时子女”的身份,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陪伴、撑腰等情感服务。对于这一服务,部分声音认为这是“存在即合理”的市场选择,能有效缓解部分老人的孤独感;也有人对此忧心忡忡,直指其背后可能潜藏着财产侵占、隐私泄露等风险。

“外包儿女”服务目前发展情况如何?该如何规范市场?记者就此展开调查采访。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宋昕怡

静默的、迟缓的、近乎停滞的,养老院里仿佛被加上了电影特效,一切都慢了下来。只有护工推着餐车走过的轱辘声和房间内偶尔传来的一两声咳嗽,在一片无声里泛起涟漪。

走进这家养老院的彭磊(化名)已然十分熟悉这幅画面。他直奔72岁陈阿婆的房间而去,将手中的礼品放在柜子上后,又搬来一张小凳子,紧挨着陈阿婆的床位坐下,开始与陈阿婆话家常。这时,房间里的气氛才“活”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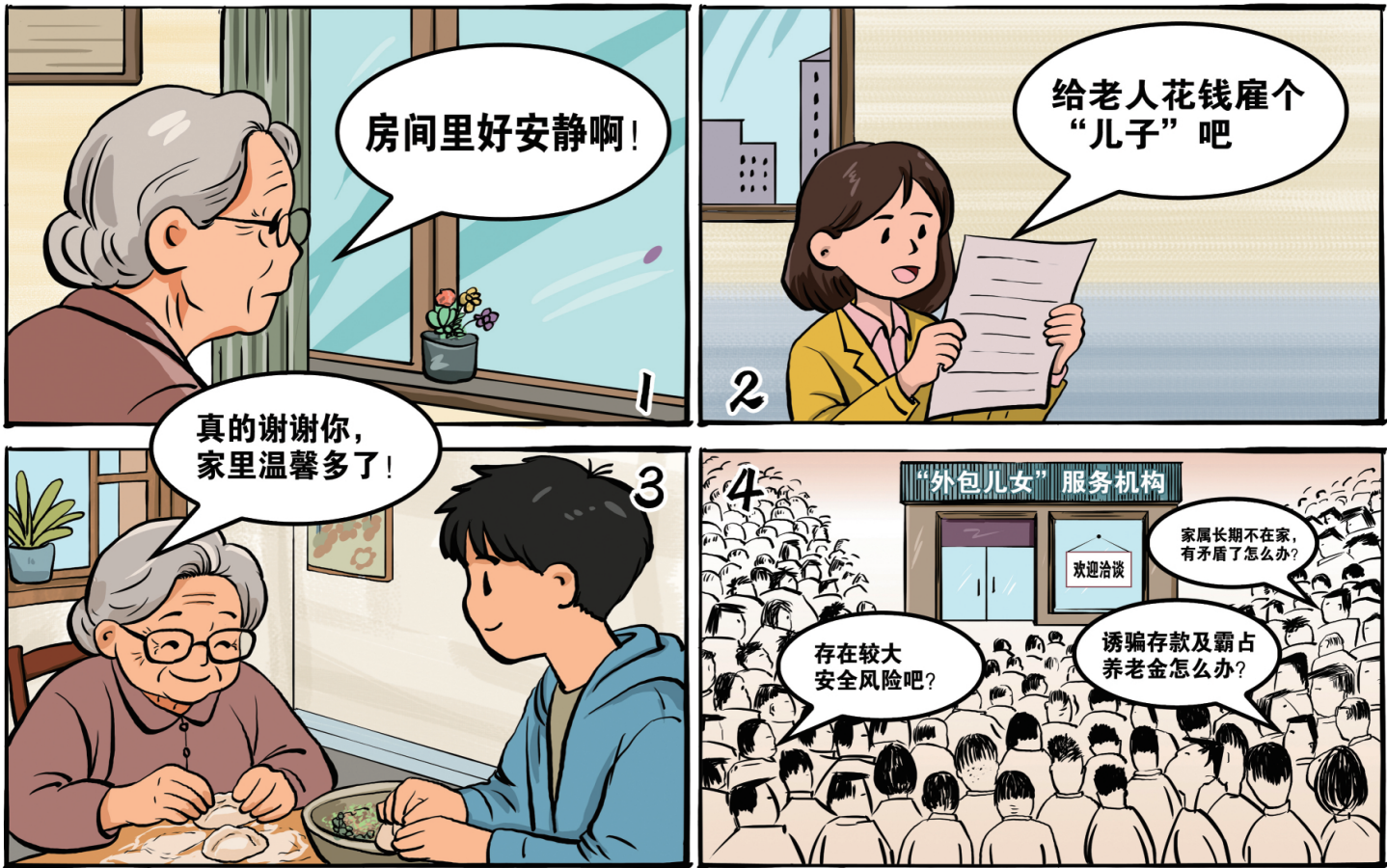
这本是一幅再寻常不过的晚辈探望长辈的温情画面——只是,陈阿婆是一名丁克老人,而彭磊则是受陈阿婆远在异地的妹妹雇佣的“外包儿子”。

彭磊是辽宁大连某“临时保镖团队”的一员。今年3月,主业是经营露营灯的彭磊与8个朋友组建临时团队(团队成员平均年龄35岁,都有自己的主业,有的是烧烤店老板,有的则经营着健身房)。他们最初的业务方向是为陷入追债困境或情感纠纷的客户提供临时护工服务,但现实需求却将他们团队的业务拓展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外包儿女”服务。团队成员大多身材魁梧、外表强悍,既能陪老人看病买菜、聊天逗乐,必要时还能帮忙“撑场面”、调解矛盾。

7月,团队发布的去养老院探望老人的视频“爆火”之后,在短短2个多月内,就由最初的9人发展至上千人,在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

彭磊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客源多是通过社交媒体、朋友引荐而来,在服务前,团队会与客户签订委托书。团队并没有固定的定价表,而是根据任务难度收取佣金,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老年人群体间的关系网络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少数老人在相处中存在的孤立、排挤甚至霸凌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有人跑腿办事,更需要一种情感上的支撑,需要有人为他们在某些场合撑腰。”彭磊说,委托人都老人的亲戚或子女,有些老人事先并不知情,“不少老人在交谈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落泪。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每次给我打电话,通话时长都在3个小时以上;还有一名老人在分别



漫画/李晓军

之际潸然泪下,说‘你们走了,这个屋子就又没声了’。”

“有老人会讲起年轻时经历过的饥荒,讲起那些好不容易才熬出头的日子,现在生活变好了,却发现自己只能在养老院里度过余生。”有一个让彭磊印象最为深刻的委托单,68岁的老人年轻时曾是山东某地商界的风云人物,名下拥有市中心多处房产和豪华轿车,随着妻子的离世与子女相继出国,老人无奈住进养老院。“见惯世面的老爷子即便心态豁达,却依旧难逃孤独的侵蚀,时常在向队员们讲述往事时潸然泪下。”

“听了心里很难受,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无论多么耐心陪伴,彭磊知道,自己的角色还是和真正的亲人不一样。

2022年10月,民政部公布一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是安全风险隐患。

丧偶、失独、离异、子女异地……种种现实原因,击穿了一些家庭的传统养老防线。

从养老院里被排挤的75岁丁克老人,再到吃上一顿饭都要取决于护工是否有责任心的瘫痪老人,接单不到半年,彭磊说自己和团队见到了太多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不为大众所了解的晚年困境。

在与一个个老人相处的过程中,彭磊团队发现,人至暮年,需要的不仅是吃饱穿暖,老年群体对情感慰藉、人格尊严、社会面子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服务市场。

比如,对于空巢老人而言,日常陪伴的安全感与情感联结的归属感,比衣食住行更更迫切。生病了有人陪诊,遇到事有人商量,节假日有人围坐,这些琐碎的需求,恰恰是养老服务中最薄弱的环节。失独与丁克家庭的困境更甚,他们不仅面临生活照料的缺乏,更承受着无人牵挂、无人依托的精

神孤独。这种情感上的空缺,成为晚年生活最深的隐忧。

彭磊说,自组建团队以来,实际承接的“外包儿女”业务只有几十单,大约仅占业务咨询量的百分之一。绝大多数人在咨询之后便没了下文。

他清楚地认识到,“外包儿女”服务的安全性、信任成本,以及那层“花钱买孝顺”的心理门槛,都是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绝大多数委托人并非老人自身,而是他们远在外地的亲属或子女,这些子女并非不孝,只是在现实压力下分身乏术,雇佣‘外包儿女’也是他们另一种形式的尽孝和情感补偿。”

记者调查发现,近日各类平台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外包儿女”业务。“外包儿女,做您的临时家人,替你看望父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记者检索“外包儿女”关键词,弹出大量此类服务“商品”,标价在300元至500元之间。

社交媒体上关于“外包儿女”的舆论两极分化严重。持支持态度的网友认为此类服务是市场的必然选择,迎合了当下的社会需求。比如彭磊团队成员的视频号评论区,有用户留言“很多老年人都需要陪伴”“只要服务态度和质量好,不愁没客源”,还有用户留言“目前的公共养老服务难以兼顾老人的情感需求,雇佣‘外包儿女’聊聊天或者摸摸场面也未尝不可”等。

另外一部分网友则对“外包儿女”服务表达了强烈的担忧,认为其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比如一网友评论称:“万一哪天老人不能说话了,被‘外包儿女’强制接出院,诱骗存款及霸占养老金怎么办?”该条评论获得大量点赞。

对此,彭磊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越来越多老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彭磊担心“有不法分子打着‘外包儿女’的幌子,对辨别能力低的老人行不法之事”。

面对外界的疑虑,彭磊团队也在摸索着前行的方向。团队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许多设想还需要“走一步看一步”。他坦言,团队目前期望能够引

起当地政府或公安部门的关注,办理备案,确保业务在透明、合规的框架下运行,也为客户多提供一层官方的安全保障。

“老人情感上的脆弱性,恰恰为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彭磊说,“外包儿女”服务目前还没有相关标准和准入门槛,仅靠从业者自律远远不够,如果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监管,那才是最理想的出路。

记者手记

我的爷爷奶奶在养老院居住了长达10年。奶奶病逝后,即使4个子女都表示愿意接老人回家,但爷爷仍然决定独居在养老院。

这份不愿给子女添麻烦的“决心”背后,是每周都有至少两个子女前来探望的事实。我记得很清楚,每次去看望爷爷,他都要拉着我去转一圈,逢人就“炫耀”。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你真幸福,又有人来看你了”。

尤其当我们节假日前接老人回家时,爷爷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其他老人那羡慕的眼神够他得意好久。

老人对陪伴的需求已是老生常谈,但这是所有老龄化社会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在中国“银发经济”的市场上,人们的关注点更多落在老年人的安全需求上。无论是社区适老化改造,还是市场上的“银发经济”产品,大多都集中于解决“跌倒怎么办”“生病了谁知道”的身体安全问题。

但除却基本的身体安全保障,老年人作为人本身的情感需求也亟须被看到。

今年国庆节前,我又来到养老院,那里的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孩子,多来,我们这里需要人”。

看到护工在老人有需求时还在玩手机,我们会及时提醒护工,看着护工完成护理工作。

据老人弟弟反馈,护工的行为有所改善,比以前勤快了一些,至少平日里无事的时候不会像过去那样直接躺在沙发上,有时还会陪老人聊天。

人老了,脾气有时会变得像孩子一样,容易因为小事耿耿于怀,将问题放大,再加上他们往往不愿主动沟通表达,容易让远方的亲人担心误解。

住在大连某养老院里72岁陈阿婆的情况就是如此。

据委托人描述,住在陈阿婆隔壁的老人总在半夜将电视或音乐的音量故意开得很响,严重影响陈阿婆睡眠。团队介入后发现,这原本是个误会。那位老人之所以将音量开得很大,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地本人听力严重受损。团队为隔壁老人买了副耳机,问题迎刃而解。令人欣慰的是,这次之后,两名曾因误会会产生隔阂的老太太,关系反而变得非常融洽。

我们服务过的这些老人,无疑是不幸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又是幸运的。至少还有人牵挂着他们,愿意付一笔不低的费用雇佣他人扮作“临时儿子”前往探望。可也有一些老人,到了晚年,一个家人和朋友也没有了,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那些老人的晚年光景又是什么样的呢?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实习生 宋昕怡 整理)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近年来,我国的公共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推进,逐步完善,但目前主要满足的是物质与照护的基本需求。面对一些老年人对情感慰藉、人格尊严、社会面子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市场作出了回应,一些人做起了“外包儿女”生意,收钱接委托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满足其情感需求。

然而,“外包儿女”尚没有行业标准和统一的准入门槛,让不少人担忧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外包儿女”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该如何规范这个新兴服务模式的未来发展?《法治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尚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

记者:“外包儿女”的出现说明了什么?杨尚东:“外包儿女”服务的出现反映了多个深层社会问题:

第一,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从家乡到外地”的流动趋势,此种生活常态意味着年轻人不可能时刻围绕在老人身边,家庭养老功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第二,空巢老人与独居老人的数量明显上升。许多空巢老人与独居老人并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新型家具等现代电子科技设备,导致其在生活方面会出现许多难题,这为“外包儿女”服务提供了相应的市场需求;

第三,社会养老机制有待完善。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主要聚焦在老年人的物质需求而非精神需求上,这导致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实现精神上的满足。此外,各地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等也造成了老年人难以享受到相应的精神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外包儿女”服务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其服务质量依赖市场规范的调整,若缺乏统一标准与严格监管,易出现敷衍服务、权益侵害等问题。

记者:老人作为被服务方,有时是亲戚与团队合约的“局外人”,其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如何得到保障?服务开始前,是否必须征得老人本人的明确同意?

杨尚东:“外包儿女”服务开始前,服务机构必须征得老人本人的明确同意,这是保障老人权益的核心前提,也是符合伦理与法律原则的基本要求。从法律角度看,老年人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他人提供的陪伴、照护服务,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在未经老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其签约“外包儿女”服务,否则可能构成对老人自主决定权的侵害。

记者:没有行业标准,没有统一准入门槛的情况下,“外包儿女”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赵精武:“外包儿女”所涉及的法律风险诸多。一是目前并没有对从业者设置相应的准入门槛,可能导致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不法分子很有可能借此作为合法掩护,实施诈骗等不法侵害;二是由于从业人员并非专业的照护人员,对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甚了解,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三是“外包儿女”倘若被老年人委托处理财产相关事宜,有可能引发财产损失纠纷;如果老年人出于感激作出财产赠与、订立遗嘱等行为,又有可能引发继承人与老年人子女之间的财产继承纠纷。

杨尚东:可能衍生出隐私风险。在服务过程中,从业者会接触到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关系、财务信息等隐私内容。在缺乏保密规范的情况下,部分从业者可能为谋取利益,将这些信息出售给第三方机构,或在社交平台随意泄露,导致老人隐私的泄露。

“外包儿女”服务纠纷的责任界定,需结合侵权行为主体、过错程度、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联性等因素综合判断。首先,从业者作为直接服务提供者,若实施侵权行为,需优先承担责任;其次,委托方若存在过错,需承担连带责任;再次,服务平台若未履行资质审查,未向老人提示服务风险等义务,或存在对从业者的违规行为知情不报情形的,需承担连带责任。最后,若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监护人未妥善选择服务主体,导致老人权益受损,监护人需先对老人的损失负责。如果监护人能够证明自身已尽到合理的监护义务,其在承担责任之后可向有过错的从业者、平台追偿。

记者:该如何规范这个新兴服务模式的未来发展?

杨尚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明确“外包儿女”仅为补充性陪伴,不能替代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不得宣传“花钱就能尽孝”等误导性内容。此外,禁止服务机构提供超出能力范围的服务,严禁机构或从业者提供医疗护理、财产管理等专业服务,避免因能力不足导致老人权益受损。同时,禁止机构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服务效果。

具体操作方面:设定机构准入标准。从事“外包儿女”服务的机构必须完成工商注册,不得超范围开展医疗、法律代理、财产管理等专业服务。此外,机构需缴纳一定金额的履约保证金,存入指定监管账户,防止机构违约后逃避责任情况的出现。

设置从业者准入标准。应当设定从业者基础资质门槛,具体而言,可以从年龄、健康状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有无职业资格证书等来构建。

明确服务规范。服务规范主要包括服务内容规范、服务过程规范以及服务责任规范。对于服务内容规范而言,应当制定统一的服务清单,明确可提供的服务范围,同时列出相应的禁止性行为,例如不得代管老人的银行卡、身份证、房产证等重要财物,不得代签遗嘱、赠与合同、理财产品协议等涉及财产或重大权益的文件,不得诱导老人进行超出需求的消费或投资等。就服务过程规范而言,服务机构需要建立服务日志制度,从业者在每次服务后应当记录服务内容,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情绪变化(以便于追溯服务过程。就服务责任规范而言,服务前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服务时间、频次、报酬标准、双方权责及应急处置方案。

赵精武:相关部门应当扮演行业引导的角色,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其发展,用以填补现有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精神照护方面的不足。例如,从业者不具备相关医疗急救知识和经验时,其从事的服务类型仅限于为老年人提供精神照护;反之,则可以允许从业者从事医疗照护方面的服务。

从业者说

我是辽宁大连“临时保镖团队”发起人,大家都叫我阿凯。

我还记得我接的第一单“外包儿子”生意。敲门后,迎接我们的是一道门缝,以及门缝后一双充满警惕和审视的眼睛。

“我们是您妹妹请来的,她不放心,托我们过来看看您。”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但门后的老人没有回应,只是沉默地将门拉得更开了一些,让我们进屋。

75岁的李奶奶平时一个人住在大连市的一个老小区,唯一的儿子车祸离世,老伴也早已故去。她的妹妹远嫁别处,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上我们,希望团队能够代替她,多去看看孤单的姐姐。我们几个人进屋后,屋子立刻显得逼仄起来。更“可怕”的是,屋里安静极了,似乎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我与丈夫的相继离去,好像两把剪刀,剪断了李奶奶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当时我就想,这份委托的意义,或许就是对老人的生活重新注入一点当下的、流动的“声响”。

第一次上门时,无论我们说什么,老人都只是淡淡地回上几句。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我们为老人做了一顿午饭、帮老人打扫了房间,其余时间

则是试图和她聊天。

起初的两次探访,都是在近乎尴尬的安静中度过的。老人不主动说话,对我们的到来,既不欢迎,也不抵触。我们只能从家务做起:打扫积灰的角落,清洗许久未用的碗筷,叠好沙发上随意堆放的衣物。

随着上门次数多了,李奶奶逐渐卸下了心防,态度愈发软化,明显的信号便是——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往事,讲她经历过的那些岁月,讲她因车祸去世的儿子,讲她病故的老伴。

这是一单价格在2000元的委托,持续一个月,我们一共探望了5次,每次待至至少6个小时。在最后一次上门探望结束时,李奶奶眼圈泛红。我们心里有不忍,向老人承诺,下次路过小区一定再上楼看看。

委托人还有远在国外不能频繁归家的子女。

比如今年70多岁的张爷爷,与老伴住在大连,委托人正是定居在国外的子女。接单时,老人的子女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到我都觉得他们啰唆,主题只有一个——张爷爷脾气火爆,不仅对家人如此,与邻里间的关系也常年紧张。

第一次上门时,老人态度果然很差——“你们来干什么?我好好的,不需要人看。”老人坐在沙发上,语气冷漠。

这次委托持续了一个半月,直到委托时间

过半,我们才慢慢了解了事实的全貌:老人之所以与邻里关系紧张,始于邻居琐碎的、带刺的非议。子女远居国外成了邻居口中的谈资,“挣大钱忘了爹娘”“孩子在国外,生了不如没生”,这些话,让向来争强好胜的老人听多了难免心中郁闷。

委托期内,我们一共上门了8次,陪老人聊天、散步、买菜,见到邻居就说自己是老人的“干儿子”。当邻居们看到总有几个身形健硕的年轻人提着东西上门,陪老人聊天、打扫卫生后,背后的非议逐渐少了,老人的情绪也平稳了不少。

子女外出务工、中年丧偶丧子,养老体系尚不完善……对于不少老人来说,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一场漫长的钝痛。

我始终记得那位在床上瘫痪了近40年的修理工。一场突如其来工伤事故,让他下半身完全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委托人是他的弟弟,诉求很明确:解决护工偷懒问题。原来,负责照料老人的护工看老人无儿无女,在日常照料上,不会主动询问老人的如厕需求,往往是等到老人失禁后才进行清理。在饮食方面,她通常一两天做一顿饭,让老人反复吃剩饭。

我们团队在两个月内前后共上门了10次,要留意床单是否干爽、平整,房间内有没有异味,在护工做饭时走到护工身边监督她是否用心。若是

『外包儿女』服务缺乏行业标准和准入门槛 专家建议
设定机构准入标准 规范未来发展